

论两汉太仆的籍贯分布及影响因素

蒋 波 杨 爽 爽

(湘潭大学 碧泉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太仆自周已置,秦时位列诸卿。两汉时期,虽然太仆的职官名称、佐官属官时有变动,但它在朝廷的重要地位一直未变。太仆的籍贯分布值得关注。两汉太仆籍贯明确的有71位,他们在各州间分布不均衡,司隶校尉、豫州、荆州三个州部较多,其中又以这些州部的京兆尹、汝南、南阳等郡为多。这一特征与国家的徙民政策、行政地理、区域开发程度、人口数量、皇帝故里等因素有关。讨论太仆的籍贯分布,对了解太仆的群体特征、不同行政区域与中央政府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均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汉代;太仆;籍贯分布;特征;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0)06-0016-09

doi:10.19742/j.cnki.50-1164/C.200602

太仆是两汉朝廷重要官僚之一,地位显赫,如《汉书·霍光金日磾传》记三公、诸卿上奏,其排序为:“丞相臣敞、大司马大将军臣光、车骑将军臣安世、度辽将军臣明友、前将军臣增、后将军臣充国、御史大夫臣谊、宜春侯臣谭、当涂侯臣圣、随桃侯臣昌乐、杜侯臣屠耆堂、太仆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农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乐成、廷尉臣光、执金吾臣延寿、大鸿胪臣贤……昧死言皇太后陛下。”^{[1]2939-2940}太仆竟然一度超过“九卿之首”的太常,紧随御史大夫、列侯,可见一斑。关于太仆,目前已有不少研究^[2],但还有一些问题如太仆的籍贯分布、朝廷对太仆的管理等问题,尚有待深入。本文拟对太仆的籍贯分布问题做初步讨论。

一、太仆的渊源及两汉太仆设置情况

“太仆”一职由来已久,《史记·周本纪》裴骃《集解》注引应劭曰:“太仆,周穆王所置。盖太御众仆之长,中大夫也。”^{[3]135}此时太仆与其佐官小臣的职能,《周礼·夏官·司马》有非常详细的记载:

大(太)仆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诸侯之复逆。王眡朝,则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于大寝门之外,而掌其政。以待达穷者与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祭祀、宾客、丧纪,正王之服位,诏法仪,赞王牲事。王出入,则自左馭而前驱。凡军旅田役,赞王

收稿日期:2020-01-13

作者简介:蒋波(1979—),男,湖南永州人,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历史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

杨爽爽(1992—),女,河南许昌人,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历史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

基金项目: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秦汉时期的国家构建、民族认同与社会整合研究”(17ZDA180)。

鼓。救日月亦如之。大丧,始崩,戒鼓,传达于四方,窆亦如之。县丧首服之法于宫门。掌三公孤卿之吊劳。王燕饮,则相其法。王射,则赞弓矢。王眠燕朝,则正位,掌摈相。王不眠朝,则辞于三公及孤卿。^{[4]2496-2510}

小臣掌王之小命,诏相王之小法仪。掌三公及孤卿之复逆,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则前驱。大祭祀、朝覲,沃王盥。小祭祀、宾客、飧食、宾射掌事如大(太)仆之法。掌士大夫之吊劳。凡大事,佐大(太)仆。^{[4]2511-2513}

《周礼》作为儒家的经典,涉及先秦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礼法规范等诸多方面,其所记载的周代官僚制度带有一定理想化设计的色彩。虽然如此,有学者仍认为它可作为考证周朝职官的佐证资料。如以上《周礼》所载的太仆佐官“小臣”一职,李学勤先生曾引用莱阳前河前出土的《纪侯壶铭》铭文时指出,该铭所载小臣职掌和《周礼》所载的小臣在大祭、覲礼时的“沃王盥”的职掌适相呼应^[5]。由此可以证明,《周礼》所言当时官员的相关职守具有相当可信度。因此,周之太仆与其佐官小臣主要负责规正君王的衣服和位置,祭祀礼仪以及为周天子上传下达等,这种情形与春秋战国时楚的左徒官“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3]2481}、两汉时的太常掌管祭祀礼仪、中朝官侍中^{[6]545}的常伴君王左右以及后世宦官的上传下达都颇有近似之处。

秦一统六国,仍设有太仆职官,只不过其性质与职掌有较大差别,《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曰:“太仆,秦官,掌舆马,有两丞。”^{[1]729}即说明秦太仆的主要职责为主管车驾和马政,而在周代马政则由校人掌管,《周礼·夏官·司马》曰:“校人,中大夫二人……掌王马之政。”^{[4]2269-2603}那么,太仆掌马政之职始于何时?《历代职官表》曰:“考成六年《传》:韩献子将新中军,且为仆大夫,公揖而入,献子从公立于寝庭。杜谓献子兼太仆。盖公自路门外揖而入于路寝庭,而献子从公。以其为太仆,掌正服位,故出入必从也。然则春秋时太仆本职,犹与《周礼》相合。襄九年《传》:使皇父命校正出马。《正义》:校正主马,于《周礼》为校人。成十八年《传》:弁纡御戎,校正属焉。注:校正,主马官。《正义》:校正当《周礼》校人。哀三年《传》:校人乘马。注云:校人掌马。然则春秋时主马政者,仍是《周礼》校人,未见其掌于太仆。《册府元龟》谓周穆王时,太仆掌舆马。以太仆本为王驭,故云掌舆马,未必若汉时之主五监、六厩也。其合太仆、校人为一职,则自《汉书·百官公卿表》始也。”^{[7]576}据上所引,太仆掌周代校人的马政之职,则当始于《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所言之秦。仔细分析《周礼》所载的大(太)仆一职,除“王出入,则自左驭而前驱”^{[4]2503}符合秦太仆为君王亲驭的职能外,其他职能则与秦太仆迥然不同。对于周、秦太仆的类似差别,古代学者早已注意到:

《周礼正义》引胡匡衷云:“大(太)仆、小臣皆侍从之官,与仆驭官别。《周礼》有大(太)仆、小臣等官,又别有大驭中大夫,与戎仆、齐仆、道仆、田仆、驭夫等皆掌驭车。《左传》诸侯有仆人,又别有戎御等官,其职各不相通。《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大(太)仆,秦官,掌舆马。’注引应劭云:‘周穆王所置也,盖大御,众仆之长,中大夫也。’是秦制以大仆掌舆马,而后之言官制者,遂误合两职为一矣。”^{[4]2261}

《历代职官表》曰:“今太仆寺之官,随沿用周太仆旧名,然其执掌迥不相合。盖太仆本侍御于尊者之名,其下有祭仆、御仆、隶仆诸官,而以太仆为之长,故称太仆。所司在服王位,招法仪,常居于大寝之门内,以左右王,当如今之领侍卫内大臣及御前大臣,其出入大命,掌诸侯之复逆,则又如今之奏事处及通政使司,其左驭前驱,则又如今之銮仪位。而马政则掌于校人,诸职不关太仆。”^{[7]573-574}

综上所述,“仆”即为御于尊者的侍御之官,周之大(太)仆乃众仆之长,常伴君王左右,既是周天子奴仆的总领,亦是天子的亲信近侍,官位虽不甚高,但地位却十分重要,权力也很大,深得君王宠信。故而发展至秦时,周之太仆职能中的祭祀礼仪等逐渐分化到其他官员身上,而为天子驾车的职能保留下来,然后与周之校人管理马政的职能逐渐结合,进而形成位列正卿的秦太仆。太仆从此亦由单管御马的

官吏一跃成为朝廷要员。

汉因秦制,三公九卿中继续保留了太仆。西汉时,太仆位列诸卿之一,其官职可能分置为左、右太仆二人,属下设有左、右曹。这可从《两汉官印汇考》《汉铜印原》等收录的西汉印章“右太仆印”^{[8]10}“太仆右曹给事中之印”“太仆左曹”^{[9]40}中看出。此外,翻检《汉书》等史籍,发现汉代仅有夏侯婴与公上不害二人在就任太仆的时间上有所重叠:夏侯婴于高帝元年(前206)至文帝八年(前172)期间担任太仆,公上不害于高帝六年(前201)至高帝十一年(前196)期间担任太仆。由此说明,汉廷可能于西汉初期设置左、右太仆二人。这或与西汉早期中央官制中,常常同一职位设有二人担任有关,如左、右丞相等。如前所述,太仆的佐官有两丞。安作璋、熊德基认为:“和诸卿一样,太仆也有丞,不过《百官公卿表》特别说明‘有两丞’,该表中有两丞的不多,只有具体事务很多的卿才有两丞。”^{[10]140}由此说明,太仆作为汉代中央比较重要的列卿官员,政务颇为繁杂,故而为保证其权力的行使以及运行,西汉太仆下设的属官较多,《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曰:“太仆……属官有大厩、未央、家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车府、路轸、骑马、骏马四令丞;又龙马、闲驹、橐泉、騊駼、承华五监长丞;又边郡六牧师苑令,各三丞;又牧橐、昆蹄令丞皆属焉。中太仆掌皇太后舆马,不常置也。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更名家马为捫马,初置路轸。”^{[1]729}除此外,散见于史籍的西汉太仆属官还包括:(1)农官。《史记·平准书》曰:“乃分缗钱诸官,而水衡、少府、大农、太仆各置农官,往往即郡县比没入田田之。”^{[3]1436}可见,汉武帝实行告缗政策后,为管理郡县没收的商人田地,于太仆下设农官一职。(2)未央厩狱。《初学记·政理部》曰:“未央厩狱,主理大厩三署郎,属太仆,光禄勋。”^{[11]494}即太仆下设未央厩狱一职,主要负责管理大厩、三署郎中因为皇帝舆马而失职犯罪的吏卒。(3)骏马监、平乐监、移中监、家车吏、厩司御。《西汉会要》记载以上五类官吏也均为太仆属官^{[12]299}。

关于西汉太仆的禄秩,《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云:“自太常至执金吾(包括太仆),秩皆中二千石,丞皆千石。”^{[1]733}然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秩律》却云:“御史大夫、廷尉、内史、典客、中尉、车骑尉、大(太)仆、长信詹事、少府令、备塞都尉、郡守、尉、〈卫〉将军、〈卫〉尉、汉中大夫令、汉郎中、奉常,秩各二千石。”^{[13]69}根据汉墓整理小组考证,《二年律令》是西汉初年官方正式的法律文书,反映的是汉初至吕后二年(前186)间的政治情况^{[13]7}。因而,笔者认为,在“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3]1417}的西汉初年,太仆秩为二千石。随着汉初统治者休养生息政策的施行,社会经济逐渐繁荣,太仆的禄秩就相应地由汉初的二千石增至中二千石,其后一直持续到西汉末年。

新莽时期,王莽依古改制,对官制进行了改创,太仆更名太御,禄秩不变。东汉继承王莽时的九卿划分,太仆恢复旧名,并且正式被确定为九卿之一,与“廷尉、大鸿胪三卿并司徒所部”^{[6]690},此时太仆的禄秩保持不变,仍为中二千石。但是随着光武中兴,国家大规模精简机构,“吏职减损,十置其一”^{[14]49},太仆的职官设置也由西汉早期的左、右二人逐渐减至一人,并省去左、右曹,其佐属官吏也大幅度减少。《后汉书·百官二》曰:“太仆,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车马。天子每出,奏驾上卤簿用;大驾则执驭。丞一人,比千石。考工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作兵器弓弩刀铠之属,成则传执金吾入武库,及主织绶诸杂工。左右丞各一人。车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乘舆诸车。丞一人。未央厩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乘舆及厩中诸马。长乐厩丞一人。右属太仆。本注曰:旧有六厩,皆六百石令,中兴省约,但置一厩。后置左骏令、厩,别主乘舆御马,后或并省。又有牧师苑,皆令官,主养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兴皆省,唯汉阳有流马苑,但以羽林郎监领。”^{[14]3581-3582}

两汉太仆除继续保留秦太仆主管车驾和马政的职责外,还常常承担一些其他职掌。一是参与朝廷重大问题的讨论与决策。如汉宣帝下诏公卿“选可使匈奴者”时,太仆杜延年参与“问状”^{[1]2371}。汉安帝时,太仆来历与太常等共同谏诤皇帝废黜太子之事,“延光中,安帝废太子为济阴王,(郑)安世与太常桓焉、太仆来历等共正议谏争。”^{[14]1226}二是举贤良方正。如太仆王音“举(何)武贤良方正”^{[1]3482}。“昱字元达,琅邪人……太仆种拂举为方正。”^{[14]2368}三是领兵作战。如“元光五年(前130),(卫)青为车骑将

军,击匈奴,出上谷;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出云中;大中大夫公孙敖为骑将军,出代郡;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军各万骑。青至茌城,斩首虏数百。”^{[3]2923}“(永平)十六年(73)春二月,(汉明帝)遣太仆祭彤出高阙,奉车都尉窦固出酒泉,驸马都尉耿秉出居延,骑都尉来苗出平城,伐北匈奴。”^{[14]120}四是掌经济职能。如太仆杜延年可以“议罢酒榷盐铁”^{[1]2664}。汉武帝实行算缗和告缗政策后,没收的民间田产也部分交由太仆来掌管^{[3]1436}。五是掌刑狱罪法。《张家山汉墓竹简·奏谳书》载:“大(太)仆不害行廷尉事,谓胡嗇夫谳狱史闾,谳固有审,廷以闻,闾当黥为城旦,它如律令。”^{[13]93}太仆杜延年亦有“分章”处理廷尉之事^{[1]2664}。六是掌警卫安全。如中元元年(56),太仆冯参在跟随汉光武帝刘秀封禅泰山时,暂行卫尉之职,负责皇帝的警卫安全^{[14]1149}。七是代表皇权巡行,宣扬德威,抚慰天下。如《汉书·平帝纪》载:“(汉平帝)遣太仆王恽等八人置副,假节,分行天下,览观风俗。”^{[1]357}又《后汉书·孝献帝纪》载:“八月,(汉献帝)遣日磾及太仆赵岐,持节尉抚天下。”^{[14]373}

总之,太仆自周已置,秦一统六国后,仍设有太仆官,只不过其性质与职掌有较大差别。汉承秦制,在西汉时居诸卿之一的太仆官,发展至东汉时被正式确定为九卿之一,并划归入司徒部;其禄秩也从汉初的二千石增至中二千石,后直至汉末不变。太仆之名除新莽时期更名太御,其余阶段皆无变动。西汉初年置有左、右太仆二人,属下置有左、右分曹,并且佐属官较多,至东汉,太仆减至一人,无左、右分曹设置,其佐属官吏也大幅度减省。两汉太仆的职掌在保留秦太仆主管车驾和马政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范围。

二、汉代太仆的籍贯分布及特征

根据《史记》《汉书》《后汉书》、宋人熊方等撰《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15]、清人梁玉绳等撰《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16]以及汉碑材料等统计,目前两汉有姓名可考的太仆官共 82 人,籍贯清楚的有 71 人(两汉太仆籍贯不明者共 11 人,其中西汉 8 人,分别为:公上不害、戴长乐、□谭、史柱国、甄舜、任宏、王恽、武让;东汉 3 人,分别为:张种、曹陵、甄举),其中西汉 20 人,东汉 51 人,他们分别来自两汉的 10 个州部 27 个郡国。具体情况如表 1。

表 1 汉代太仆籍贯分布统计表

州部	郡国	西汉	东汉	总数	州部	郡国	西汉	东汉	人数
司隶校尉部	京兆尹	2	3	5	豫州	颍川郡	1	6	7
	左冯翊	1	0	1		汝南郡	1	8	9
	右扶风	2	2	4		沛郡(国)	2	3	5
	河南尹	0	3	3		鲁国	1	0	1
	河内郡	1	1	2		合计	5	17	22
	弘农郡	0	4	4	冀州	魏郡	3	0	3
	合计	6	13	19		合计	3	0	3
兖州	山阳郡	1	1	2	徐州	东海郡	0	1	1
	泰山郡	0	1	1		琅琊郡	0	1	1
	合计	1	2	3		合计	0	2	2

州部	郡国	西汉	东汉	总数	州部	郡国	西汉	东汉	人数
荆州	南阳郡	1	7	8	凉州	陇西郡	1	0	1
	南郡	0	1	1		安定郡	0	1	1
	江夏郡	0	2	2		北地郡	2	0	2
	长沙郡	0	1	1		武威郡	1	0	1
	合计	1	11	12		合计	4	1	5
扬州	庐江郡	0	1	1	益州	蜀郡	0	2	2
	会稽郡	0	1	1		合计	0	2	2
	合计	0	2	2	并州	太原郡	0	1	1
						合计	0	1	1

通过上述统计可见:汉代太仆籍贯分布于豫州的人数最多,有22人;其中颍川郡7人,包括灌夫、祭彤、韩棱、杜密、郭禧、陈纪、韩融;汝南郡9人,包括刘舍、袁安、张酺、张郴、袁敞、袁汤、袁逢、李咸、袁基;沛郡(国)5人,包括夏侯婴、陈万年、朱浮、陈宠、闻人袭;鲁国1人,即丙显。其次是司隶校尉部和荆州。司隶校尉部有19人;其中京兆尹5人,包括张延寿、甄尊、张纯、宋汉、赵岐;左冯翊1人,即王章;右扶风4人,包括逢信、范隆、马光、鲁旭;河南尹3人,包括侯昱、左称、种拂;河内郡2人,包括石庆、张延;弘农郡4人,包括杨震、杨秉、邓盛、杨彪。荆州有12人;其中南阳郡8人,包括杜延年、赵憙、冯鲂、邓彪、任隗、来历、邓康、宗俱;南郡1人,即胡广;江夏郡2人,包括黄琼、黄琬;长沙郡1人,即刘嚣。再次是兖州和冀州。兖州有3人;其中山阳郡2人,包括丁宪、王龚;泰山郡1人,即马英。冀州魏郡有3人,包括王音、王襄、王舜。汉代太仆籍贯分布于徐州、扬州、益州、并州的人数较少。徐州有2人,其中东海郡1人,即陈耽;琅琊郡1人,即伏恭;扬州有2人,其中庐江郡1人,即周景;会稽郡1人,即朱俊。益州有蜀郡2人,包括赵戒、赵典。并州仅有1人,即太原郡王允。

根据以上情况,可知汉代太仆的籍贯分布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汉代太仆在各州部间籍贯分布不均衡。据上表可知,汉代太仆籍贯分布的密集地区在豫州、司隶校尉部和荆州三个州部。其中豫州共有22人,约占汉代太仆籍贯可考者总人数的30.99%;司隶校尉部共有19人,约占汉代太仆籍贯可考者总人数的26.76%;荆州共有12人,约占汉代太仆籍贯可考者总人数的16.9%。两汉时期,仅来自豫州、司隶校尉部、荆州这三个地区的太仆就有53人,约占汉代太仆籍贯可考者总人数的74.65%。汉代太仆籍贯分布较为密集的地区是凉州、冀州、兖州、徐州、扬州、益州。其中凉州共有5人,约占汉代太仆籍贯可考者总人数的7.04%;冀州、兖州各有3人,分别约占汉代太仆籍贯可考者总人数的4.23%;徐州、扬州、益州各2人,分别约占汉代太仆籍贯可考者总人数的2.82%。汉代太仆籍贯分布最少的地区是并州,仅有1人,约占汉代太仆籍贯可考者总人数的1.41%。青州、幽州、交州则无担任太仆的人员。

第二,汉代太仆群体在同一州部各郡国间籍贯分布不均衡。汉代太仆群体的籍贯分布不但在各州部间不均衡,而且在同一州部各郡国间也不均衡。笔者以汉代太仆籍贯分布最为密集的豫州、司隶校尉部和荆州三个地区为例。据上表可知,籍贯为豫州,分布于颍川郡、汝南郡、沛郡(国)、鲁国的22位太仆中,其中来自汝南郡的人数最多,有9人,约占豫州籍贯可考者总人数的40.91%;来自颍川郡的有7人,约占豫州籍贯可考者总人数的31.82%;来自沛郡(国)的有5人,约占豫州籍贯可考者总人数的22.73%;而来自鲁国的人数最少,仅有1人,约占豫州籍贯可考者总人数的4.55%。籍贯为司隶校尉部,分布于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河南尹、河内郡、弘农郡的19位太仆中,其中来自京兆尹的人数最

多,有5人,约占司隶校尉部籍贯可考者总人数的26.32%;来自右扶风和弘农郡的各有4人,分别约占司隶校尉部籍贯可考者总人数的21.05%;来自河南尹的有3人,约占司隶校尉部籍贯可考者总人数的15.79%;来自河内郡的有2人,约占司隶校尉部籍贯可考者总人数的10.53%;而来自左冯翊的人数最少,仅有1人,约占司隶校尉部籍贯可考者总人数的5.26%。籍贯为荆州,分布于南阳郡、南郡、江夏郡、长沙郡的12位太仆中,其中来自南阳郡的达8人之多,约占荆州籍贯可考者总人数的66.67%;来自江夏郡的有2人,约占荆州籍贯可考者总人数的16.67%;而来自南郡和长沙郡的人数最少,皆仅有1人,分别约占荆州籍贯可考者总人数的8.33%。由此可见,汉代太仆群体籍贯分布在同一州部各郡国间也极其不均衡,相对集中在该州部的某些郡。

第三,东汉时期的太仆较西汉时期籍贯分布更为集中。据上表可知,西汉时期太仆籍贯分布地较为分散,其中来自司隶校尉部的有6人,占西汉太仆籍贯可考者总人数的30%;来自豫州的有5人,占西汉太仆籍贯可考者总人数的25%;来自凉州的有4人,占西汉太仆籍贯可考者总人数的20%;来自冀州的有3人,占西汉太仆籍贯可考者总人数的15%;来自兖州和荆州的各有1人,分别占西汉太仆籍贯可考者总人数的5%。东汉时期,太仆主要集中来自于豫州、司隶校尉部和荆州这三个地区。其中来自豫州的有17人,约占东汉太仆籍贯可考者总人数的33.33%;来自司隶校尉部的有13人,约占东汉太仆籍贯可考者总人数的25.49%;来自荆州的有11人,约占东汉太仆籍贯可考者总人数的21.57%。此三州部的太仆总人数为41人,约占东汉太仆籍贯可考者总人数的80.39%。在这三个州部中,籍贯分布密集的是豫州的汝南郡、司隶校尉部的弘农郡、荆州的南阳郡。籍贯为此三郡的太仆总人数是19人,约占东汉时期太仆籍贯可考者总人数的37.25%。其它各州部的太仆籍贯分布则比较分散,其中来自兖州、徐州、扬州、益州的各有2人,分别约占东汉太仆籍贯可考者总人数的3.92%;来自凉州、并州的各有1人,分别约占东汉太仆籍贯可考者总人数的1.96%。由此可见,东汉时期的太仆较西汉时期籍贯分布地更为集中,且多集中于豫州的汝南郡、司隶校尉部的弘农郡、荆州的南阳郡。

三、太仆籍贯分布的影响因素

考前所述,虽然汉代太仆籍贯分布的情况比较复杂,但是尚有规律可循。从地域来看,各州部间分布不平衡,同一州部各郡国之间分布也不均衡。从时间来看,东汉时期太仆的籍贯分布比西汉时期更为集中。这些现象的产生并非偶然,与当时的国家政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人口以及地理位置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

一是西汉的徙民政策。西汉建国之初,因楚汉战争,关中经济凋敝,人口稀少,为了充实京畿之地,政府设置陵县,实行徙民于这些陵县的政策。《汉书·地理志下》载:“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桀则游侠通奸。”^{[1]1642}如太仆王章,“其先高祖时有功赐爵关内侯,自沛徙长陵。”^{[1]3969}太仆马光,其先祖于“武帝时,以吏二千石自邯郸徙”^{[14]827}至茂陵。太仆鲁旭,其先祖“世吏二千石,哀、平间,自鲁而徙”^{[14]873}至平陵。葛剑雄进一步总结了西汉的徙民对象,分为八类:丞相、御史大夫、将军等现职高级官员,即所谓“七相五公”;宠臣、公主、外戚及其他特殊人物;吏二千石,包括九卿、郡太守、都尉、郎中令等;六国诸侯、贵族后裔;豪杰;高訾富人;群盗;汉初功臣的后裔^{[17]140-142}。这些被迁徙的人口及其后代,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强烈的参政意识、良好的入仕环境和丰厚的物质基础。故而在两汉时期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该地区入仕为太仆的比例更大。

二是政治、经济中心因素。以长安为中心的三辅地区和以洛阳为中心的三河、弘农地区分别为两汉时期的政治、经济中心。首先作为政治中心,长安、洛阳先后为汉代的国都所在地,这一便利的区位优势,相对其他地区而言,能为人们的入仕升迁提供无可比拟的机遇。“政治中心区附近官吏籍贯分布密

集,这是古代人物分布的一条通则。”^{[18]234}其次,自先秦以降,以长安为中心的三辅地区,经济就较为发达。据《汉书·地理志下》载:“故秦地……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穡,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有鄂、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1]1642}西汉时,关中地区商业活动频繁、富商大贾众多。《汉书·货殖传》云:“关中富商大贾,大氏尽诸田,田墙、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氏亦巨万。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迄王莽,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孙大卿,为天下高訾。”^{[1]3694}西汉后期,随着关中地区的频繁战乱,该地区的经济逐渐衰弱,“关中遭王莽变乱,宫室焚荡,民庶涂炭,百不一在”^{[14]1786},甚至出现“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14]484}的悲惨景象。为此,“光武受命,更都洛邑。”^{[14]1786-1787}随着政治中心的东移,以洛阳为中心的三河、弘农地区逐渐成为东汉时期的经济中心。如河内郡,由于在两汉之际没有遭到兵火的损害,故而“户口殷实”,以“完富”^{[14]621}著称,即使是在东汉末年的大动荡时期,仍旧“表里山河,土广民殷”^{[19]659}。以上这些地区,在两汉时期农业发达,商业活动频繁,这就为该地区人物的政治活动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据李泉研究,“两汉官吏籍贯分布最密集、次密集的地区,几乎全是经济发达区域。”^{[18]234}故而他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官吏籍贯分布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18]238}因此两汉管辖三辅、三河以及弘农地区的司隶校尉部成为汉代太仆籍贯分布密集的地区。

三是文化因素。西汉建立后,为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统治者逐渐确立以察举为主的选官制度。汉武帝采纳董仲舒“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1]2523}的建议后,汉代遂以儒学为官学,并开创了主要以儒术取士的察举新规。《汉书·武帝纪》云:“建元元年(前140)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绡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1]155-156}此后,察举制的选官标准逐渐明确为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勇足决断,才任三辅令。”^{[20]125}据刘丁豪统计,西汉中期(武帝至宣帝)的儒学名师或师从名家的儒者(包括太学生)在公卿中所占的比例为15.7%,至西汉后期(元帝至平帝)和东汉(光武帝至献帝)则分别达到了32.3%和30.3%^[21]。因此,精通儒学逐渐成为汉代知识分子进入仕途乃至位列公卿的重要途径之一。又因西汉建立后,随着“休养生息”政策的施行,关中地区的经济逐渐恢复,随之,该地区的文化也得到较大的发展。班固《两都赋》在描述这一带时称:“名都对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黻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五公。”^{[14]1338}王子今也认为该地区此时“堪称文化的天府”^[22]。东汉都城迁至洛阳后,全国的文化中心由原来的齐鲁地区逐渐西移至东汉政治、经济中心——洛阳附近的颍川、汝南一带^{[23]55-98}。卢云称:“东汉时,这一带文化迅速发展,公卿、学者、士人之众,著述之多,均居于诸郡国的前列。”^[24]因此,汉代籍贯分布于管辖关中地区的司隶校尉部和管辖颍川、汝南的豫州的太仆也就相对集中。

四是人口因素。如前所言,汉代的选官以察举制为主,察举的科目主要包括孝廉、茂才、贤良方正与文学、明经、明法等,其中又以举孝廉的人数最多。有学者统计,自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初令郡国举孝廉,到汉献帝禅位曹丕的三百五十余年间,共举孝廉约七万四千余人^{[25]106}。正如徐天麟所云:“汉世诸科,虽以贤良方正为至重,而得人之盛,则莫如孝廉,斯以后世之所不能及。”^{[26]391}此外,汉代察举制自确立以来,每郡岁举孝廉两人,直至东汉和帝时,则改为按郡国人口比例察举孝廉。《后汉书·桓荣丁鸿列传》言:“时大郡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二人,帝以为不均,下公卿会议。(丁)鸿与司空刘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阶品,蛮夷错杂,不得为数。自今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帝从之。”^{[14]1268}故而汉和帝之后,人口数量的多少则基本决定某一地区被察举入仕的官员人数。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东汉人口较多的地区分别为:汝南郡有口2100788^{[14]3424},南阳郡有口2439618^{[14]3476},按上述比例,则此二郡每年岁举孝廉分别为:10人、12人。又据黄留珠所考出的

两汉由孝廉拜官授职者 159 人中,其中中央官员 111 人,约占 69.81%;地方官吏 48 人,约占 30.19%^{[25]106-144}。由此可见,士人被察举为孝廉后,很大程度上会入京为官。因此,汉代尤其是东汉时期籍贯分布于汝南郡以及南阳郡的太仆也就会相对集中。

五是东汉“帝乡”的影响。东汉时期的荆州成为汉代太仆籍贯分布的密集地区之一。一方面,与其下辖的南阳郡为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帝乡的政治地位有密切关联。新莽末年,刘秀在家乡南阳豪族的支持下,举兵起义,建立了东汉政权。由于南阳豪族在东汉王朝的建立上起了巨大的作用,故其政治和社会地位不断上升,致有“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14]781}之说。如南阳豪族邓氏、阴氏、樊氏等家族在政治上享有特权,经济上颇具实力,文化上世代相传,在东汉初年已达不可遏制之势。此外,南阳不仅是东汉王朝的发迹地,还是东汉统治者祖宗园陵的所在地。东汉诸帝巡视南阳,回乡祭祀祖先多达十二次,说明南阳在东汉时期已经成为仅次于京师洛阳的区域,备受统治者的重视。以上这些因素都使得南阳郡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获得巨大发展,进而也为南阳人的入仕、升迁提供良好的机遇。另一方面,东汉统治者在拜将任官方面,好用南阳人。据廖伯源统计,仅汉光武帝时期,在可考的三公总数 28 人中,南阳籍有 12 人,约占总数的 42.86%;在籍贯可考的九卿总数 34 人中,南阳籍有 12 人,约占总数的 35.29%;在籍贯可考的郡国守相总数 121 人中,南阳籍有 31 人,约占总数的 25.62%^{[27]164}。南阳籍官吏在此时期内所占比例如此之大,这恐怕与汉光武帝对南阳同乡的特别感情有关。如被范曄评价为“断断小宰,无它庸能”^{[14]872}的卓茂,以七十之余的高龄,被汉光武帝任命为东汉首位太傅,并“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户”^{[14]871}。在学术方面,卓茂虽“称为通儒”,但其远不如同时期的范升、陈元、郑兴等人知名。在治民方面,也同样逊色于同时期的谯玄、李业、卫飒等人。光武帝以卓茂为道德楷模,表率天下,这与其南阳人的身份不无相关。“同乡则言语习惯相同,较易取信,而其中有名者且久闻其声明。俱用人时最容易入选者。”^{[27]157}正是因为汉光武帝好用南阳人为吏,故而有郭伋上谏光武帝“选补众职,当简天下贤俊,不宜专用南阳人”^{[14]1092}之举。光武之后的东汉统治者,亦遵循好用南阳人之原则。因此,东汉时期的南阳郡成为汉代太仆籍贯分布的密集地区之一。

综上所述,太仆作为两汉的高级官吏之一,其籍贯分布受到汉代国家政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人口以及地理位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而主要集中于豫州的汝南郡、司隶校尉部的京兆尹、荆州的南阳郡这些政治地位重要、经济富庶、文化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考察两汉太仆的籍贯分布及其原因,不仅对于我们了解其他汉代高级官吏的籍贯分布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汉代不同时期各个区域政治势力与中央政府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变化。

[参 考 文 献]

- [1]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 陶希圣,沈巨尘. 秦汉政治制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安作璋,熊铁基. 秦汉官制史稿[M]. 济南:齐鲁书社,1984;王育民. 秦汉政治制度[M].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陈宁. 秦汉马政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沈刚. 两汉太仆考述[M]//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 12 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
- [3]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4] 孙诒让. 周礼正义[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 [5] 李学勤. 从金文看《周礼》[J]. 寻根,1996(2).
- [6] 杜佑. 通典[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 [7] 纪昀等. 历代职官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8] 孙慰祖. 两汉官印汇考[M]. 香港:香港大业公司,1993.
- [9] 汪启淑. 汉铜印原[M]. 杭州:西泠印社,1996.
- [10] 安作璋,熊铁基. 秦汉官制史稿:上册[M]. 济南:齐鲁书社,1984.

- [11] 徐坚等. 初学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12] 徐天麟. 西汉会要[M]. 北京:中华书局,1955.
- [13]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 [14] 范曄.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5] 熊方等. 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6] 梁玉绳,等. 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7] 葛剑雄. 西汉人口地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18] 李泉. 东汉官吏籍贯分布之研究[M]//秦汉史论丛:第5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
- [19]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20] 孙星衍等辑. 汉官六种[M]. 周天游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90.
- [21] 刘丁豪. 汉代官吏群体的儒学化及其对汉代社会的影响[J].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
- [22] 王子今. 长安:西汉经学的“天府”[J].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 [23] 卢云. 汉晋文化地理[M].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
- [24] 卢云. 东汉时期的文化区域与文化重心[M]//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4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
- [25] 黄留珠. 秦汉仕进制度[M].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
- [26] 徐天麟. 东汉会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27] 廖伯源. 秦汉史论丛续编[M]. 北京:中华书局,2018.

On the Distribution Featur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Taipu's Native Places in the Han Dynasty

Jiang Bo Yang Shuangshuang

(College of Biquan,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The Taipu had been set up in the Zhou Dynasty and it became one of the Zhuqing in the Qin Dynasty. During the Han Dynasty, although the official names and subordinate officials of the Taipu were changed from time to time, its important status in the imperial court remained unchanged. The distribution of Taipu's s deserves attention. In the Han Dynasty, there were 71 Taipus with a clear place of origin and they were unevenly distributed among the states. There were many Taipu officials in the three states of Silixiaowei, Yuzhou and Jingzhou, and most of them were Jingzhaoy in Runan and Nanyang. This feature was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migrant policy administrative geography the degre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population size the emperor's hometown and other factors. Discussing the distribution of Taipus has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group features of Taipu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regions and central government.

Keywords: Han Dynasty; Taipu; distribution of native places; feature; influencing factors

[责任编辑:刘力]